

学海星光

# 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

夏海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也是党的优良作风。“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美国学者施拉姆研究认为:“毛泽东思想中充分阐述了领导者和群众之间诸如此类的各种关系。总的来说,群众路线是贯穿此类关系的核心概念。”(《毛泽东的思想》)

所谓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毛泽东不仅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而且终生坚持群众路线。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他认为共产党人要“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坚定地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千万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确信“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制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制。”

解放战争期间,面对如何打开东北局面,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以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地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我力量增加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巩固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诚如恩格斯所言:“一个很明显而从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卡尔·马克思》)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劳动人民的历史。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反复强调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



油画《农村调查》 邓澍 作

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反复强调人民群众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决定力量,“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涤荡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辩证法也是认识论,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发展过程,即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为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就像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于实践之中,抽象升华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为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去,就是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过程,“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充分尊重群众,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完全相信群众,“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真正关心群众,“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生

产,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尤其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从而使群众信任我们,坚定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决心,“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具体化为个别与一般、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是一对矛盾,犹如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是事物发展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一般揭示事物的本质,比个别深刻而稳定;个别反映事物的现象,比一般丰富而生动。在任何工作中,一般是号召,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个别是落实,既要使一般号召落到实处,更要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和符合客观实际。只有把一般号召与个别行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问题。领导与群众也是一对矛盾,而领导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脱离群众,经常表现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以及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群众要求相结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结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无论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还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都要求“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

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正确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比喻为种子与土地的关系,种子离不开土地,离开土地,种子就无法生存,“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比喻为学生与老师关系,共产党人首先要做人民的学生,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1931年在兴国调查和1933年在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毛泽东找了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座谈访问,认为“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1941年3月,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写道:“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我和全党同志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1950年,毛泽东为母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题写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正确处理党与群众的关系,关键是要紧密联系实际,而不是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要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紧密联系实际,不能超前于群众,搞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也不能落后于群众,搞尾巴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毛泽东强调,只有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才能紧密联系实际,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人生 槲英

梁衡先生的书桌上,放着一则打印出来的新华社报道,“从囚室到刑场的《觅渡》:穿越32198天?”——电影《觅渡》导演宁敬武带领瞿秋白的扮演者宋洋和恽代英的扮演者谷嘉诚,在福建长汀从瞿秋白的“囚室”徒步至罗汉岭下,感受88年前瞿秋白人生最后的2180步。88年前瞿秋白舍生取义的背影远去,一个又一个的创作者试图探寻他谜一样的内心世界,他热烈如火又貌似淡泊出世的生活。如果说他从家乡觅渡桥上出发是为黑暗中国寻路的一生,那一代代创作者何尝不是努力跋涉到他内心深处寻找那颗“玫瑰花蕾”的“觅渡”?

### 从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到电影《觅渡》

2023年8月1日,梁衡先生观看了即将公映的电影《觅渡》。眼含热泪的梁衡久久不能平静,他肯定了电影赋予了“觅渡”的新主题。他说:“《觅渡》就是在继续寻找光明,在继续寻找前途、在继续实现我们的理想,就像我们的中国梦一样。”

1996年6月25日,梁衡创作出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在作品中,梁衡以其深邃的思想与犀利的文笔表达了对瞿秋白的敬仰之情。

电影《觅渡》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押入狱作为叙事的开始,以他写作饱受争议的《多余的话》和自传《痕迹》并应对劝降为经,以回忆他的人生片段为纬,穿插和同乡好友张太雷、恽代英的生命交集,死亡的倒计时使他加倍感受着生命的每一天每一刻。瞿秋白于囚室中凝望新生雏鸟,听窗外飘来的戏曲唱段,如杜甫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热爱这个世界,也不畏惧死亡。他甚至说,有时候,死是另一种生。梁衡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道:“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铁轨的延伸一样坚定。”

觅渡桥是三位革命者共同的起点。梁衡先生苦思多年发现了觅渡桥的意象,而电影无疑是在梁衡先生文学“觅渡”之后的再出发,是瞿秋白精神感召下的创作“接力”之旅。

### 《觅渡》是有关生命选择的悲剧赞美诗

梁衡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谈及,这是一场自己耗时了6年的创作之旅。期间他曾多次到过常州,于瞿秋白纪念馆旧址的房舍中流连沉思,却没有写出关于瞿秋白的文章。因为瞿秋白太博大精深,“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

书写瞿秋白,梁衡6年的长思与顿悟才铸就名篇。若是拍摄一部瞿秋白的传记电影呢?如果把三位革命者写进一部电影中呢?

导演宁敬武准备迎接这样的挑战。这位本科学中文、硕士读电影导演的学者型导演是不多能独立编剧又导演的,他有近10部的人物传记电影的创作经历,他准备既挑战瞿秋白人物塑造的复杂性以及兼顾张太雷、恽代英的塑造,又要挑战电影本体,挑战电影在时空、空间结构的叙事极限。电影从瞿秋白被捕入狱讲起,身份未暴露之前鲁迅等人的营救,身份暴露后写作《多余的话》和自传《痕迹》纲要,在死亡倒计时中回忆人生片段和国内国际大事件,回忆和张太雷、恽代英的交往,直至走向刑场。三个空间:小小囚室,从常州、武昌、北京、莫斯科、上海、广州国际大舞台,感知生命和死亡的心灵空间。三个时间轴:从入狱到牺牲的百余天,三位革命者的人生,狱中瞿秋白与劝降者、军医等人交谈、辩论涉及的事件和时间。这三个空间和三个时间轴会跳跃、交错、穿插,并且需要观众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知识,又涉及共产国际和中共建党的关系等影视较难清晰表现的复杂历史事件。

电影《觅渡》就是这样一部知难行难的作品。宁敬武创作团队匠心独具,电影拍摄历时三年,剧本十易其稿。宁敬武导演谈及,电影的开机时间正好是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时历史上的同一天,每拍摄一天,就是瞿秋白走近死亡的一天。当电影拍摄到瞿秋白牺牲的6月18日时,自己几近崩溃。《觅渡》是一篇有关生命选择的悲剧赞美诗,是一次充满难度挑战的电影探索之旅。

梁衡先生肯定了电影《觅渡》这场知难行难的创作“冒险”。他在观看《觅渡》时非常感动,越到电影结尾越止不住落泪。他观影后谈及,宁敬武导演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艺术创作。他在此前很为导演担心,要怎么讲好这三位复杂而伟大的革命者的故事?当他看到电影以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从觅渡桥出发寻找人生的故事设计时感慨万分,导演的创作构思非常巧妙。《觅渡》通过多线并行的顺叙、倒叙和夹叙的方法,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艺术创作!

### 不同“觅渡”中共同的美学主题

悲剧之美是梁衡散文中的重要主题。在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的结尾处

## 梁衡·从瞿秋白的《觅渡》到创作者的《觅渡》

李彬彬



电影《觅渡》海报

中,梁衡将项羽与瞿秋白进行了创新性的“并列”。梁衡认为,项羽拒渡河,面对生的希望举起了自刎的剑;瞿秋白在英名流芳时举起了解剖刀,把行将定格的生命价值再推上了一层。这是“失败者”的故事,却也是英雄的故事。他们在生命最后关头求真。“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

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容赴死,却也赞美自由与新生。他希望留给世界他最后的真,思想的深邃与真理的高贵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散文《觅渡,觅渡,渡何处》与电影《觅渡》中都反复出现了瞿秋白的遗作《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如同一座守护着瞿秋白精神世界的迷宫之门,它拷问着创作者们对于瞿秋白生命选择的理解。唯有回答出坚定答案的人才能抵达秋白先生深邃的思想世界。

梁衡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道:“他觉得自己实在渺小,实在愧对党的领袖这个称号,于是用解剖刀,将自己的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谈一谈这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

不同时代的读者与创作者会感受到共同的悲剧之美。在梁衡写完《觅渡,觅渡,渡何处》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老人在给梁衡的信中写道:“先生的一支笔概括了父亲的一生,提炼了他生命的精华,让没有读过党史的人,也能清晰地感到父亲的思想脉络,和他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如今,当我散步时,常有知情的年轻人上来嘘寒问暖,说他们读了这篇文章后,加深了对父亲的认识,亦深感其启迪人生。静夜沉思,咀嚼先生美文,我常心存感激,感谢先生将个人的思考变成了亿万人对父亲的追思。”

于历史长河中,那位“不肯过江东”的西楚霸王项羽的故事至今流传;瞿秋白的故事让两代创作者分别耗时六年、三年进行创作“接力”;千年武侯祠的游客至今络绎不绝……因为,他们被“百姓筛选、历史擢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也希望更多观众从《觅渡》中感受到关于生命真谛的那道灵光,成为心中有光的人生“觅渡者”。

边走边写

## 行走在苏东坡的宅子里

刘友洪

沿着由古木、翠柳、绿竹、荷塘、红墙、翘檐组成的画卷自由徜徉,自树梢倾斜而下的各色绿韵扑面而来。如果此时,你放慢脚步,静下心来,定能体会到一番不一样的心境。

(一)

不管在海棠园,还是在橘园,抑或是竹园,东坡都如影随形。“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一边观赏海棠花的娇艳,一边体悟东坡谪居黄州的清冷。“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齿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除了橘唇齿留香的味道,更重要的是,苏东坡从屈原的手中,接过了橘的信念、精神和气节。“低昂中音会,甲刃纷纷相触。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风萧竹已回,风猗猗青玉”,亭亭玉立的翠竹,带给苏东坡对故乡的印记,也赋予了苏东坡竹的风骨。

走进三苏祠,就从当下走进了历史,从现实走进了神往,从踏雪寻梅走进了璀璨文化。

(二)

行走在三苏祠,山也幽幽,水也幽幽。

如果说乡愁有深度的话,那么三苏祠的“水”已经深千尺了。眉山是“三苏”的“原点”,他们以此为圆心,像水波一样一圈圈荡漾开去。比如东坡先生,从出生到21岁第一次出川,加上两度回乡丁忧,苏东坡在眉山待了25年,直至33岁离开故土,再也未能回来,死后也葬在了河南郑县。东坡先生用他一生超过三分之一的时光,在故乡的土地上留恋踌躇,踟蹰徘徊。人过而立之年,心性就稳定了下来,故土的养分已将他滋养得枝繁叶茂,他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都深深地浸润在故乡的风物之中。以至多年以后,苏东坡回望故乡时,写下了“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麦齐腰”“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这种款款深情的美文。

(三)

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用灵与肉堆积起一个强大的东坡文化磁场,三苏祠正是这磁场的中心。

好比迎面而来的这缕风,它从南大门何绍基手书的“三苏祠”三个字的背影里拂过,带着“文献一家”“是父是子”的景仰,“文章气节”“文峰鼎峙”的豪迈,“宦迹渺难寻,只博得三杰一门,前无古后无今,器识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天心原有属,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父子兄弟,依然风雨共名山”的绝响,从前厅“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字里行间中,吹了出来的。这风,给楹联牌匾以及三苏祠的万事万物赋予了永恒的生命,让它们在意外的长河里,依然熠熠生辉。

古往今来,瞻仰“三苏”,吟咏东坡者指不胜数。南宋有陆游“蜿蜒东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的盛情颂扬,清代有何绍基“惟有三苏

祠,时时梦魂绕。翩然复戾止,一慰两年别。三子如有灵,为我展齿折。今人友古人,古贤友来哲”的魂牵梦绕。

(四)

细细算来,三苏祠自元代延祐三年改宅为祠以来,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万物竟如此相似,三苏祠的历史就如同苏东坡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几经兴衰沉浮,也曾片瓦无留,但三苏祠在国人川人眉山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中,得以保存。如今,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苏祠获得极大保护和传承,成为一条通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甬道。

而今的三苏祠伫立时代潮头,从一叶小舟成长为一艘轮船,需要勤加保养才能行稳致远。在这艘船上,有无数默默无闻倾情付出的“小人物”,他们不留名不留姓,他们叫“三苏看门人”,叫“苏家园丁”,叫“苏门一子”,他们中有多少人情定三苏,终其一生而无怨无悔。